



寻找英雄

重温一种伟大精神

北京日报纪事采写组 编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寻找英雄

重温一种伟大精神

北京日报纪事采写组 编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英雄：重温一种伟大精神 / 北京日报纪事采写
组编著. — 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477-2169-8

I. ①寻… II. ①北… III. ①革命烈士—生平事迹—
中国 IV. ①K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2783号

寻找英雄 重温一种伟大精神

出版发行 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010）65255876
总编室（010）65252135
印 刷 廊坊飞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460千字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赵靖云

“寻找英雄”，是从北京日报《纪事》栏目自2007年创办迄今积累的两百多篇作品中拈出的一个主题，也是《纪事》栏目经营多年，从来不曾放下的主题。

古往今来一切历史，皆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同时亦始终为英雄的光辉所照耀。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英雄。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有英雄而不知爱重的民族尤其可悲。今天的中国社会，开放、多元，价值观在嬗变，观念思潮在刷新。有人说，关于英雄的说教已经过时；有人问，英雄事迹是真的吗？有人主张，英雄概念不妨与时俱进，能创业能挣钱的都称英雄；更有人认为，追星取代“英雄崇拜”乃社会进步之表现。不，我们不这么看。

英雄之为英雄，不关其他，其核心特质在他们身上共有的一种基于博大情怀的牺牲精神。中国语文中自古就有众多语汇形容这样的精神——舍生取义、克己奉公、毁家纾难、为国捐躯……甘心为大众奉献小我，为价值舍弃利益，为信仰抛头洒血，正是这样一种牺牲精神的存在，这样一群人的存在，升华了人的境界，彰显了人之高贵，使得人不尽然是一种被趋利避害本能统治的功利动物。

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不匮乏英雄。近代以来，在致力于民族复兴的路途上，无数先烈前赴后继、血荐轩辕。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如鲁迅先生言，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中国得有今日，他们理应被永远感念和铭记，是他们甘为前驱苦力，鲜血淋漓地于遍地荆榛中开辟了道路，以血汗浇沃出满途鲜花。他们的功烈不可磨灭，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他们的英名不容玷污。

寻找英雄，是为了讲述那些远去的故事，更是为了在“小时代”的世俗风气里重温一种伟大精神。作为负有社会责任的媒体，我们愿意将这件事一直做下去。

（作者为北京日报社总编辑）



碧血春花.....	001
——李大钊就义前后	
秋之白华.....	018
——瞿秋白唱着《国际歌》从容赴死	
英雄乐章.....	035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勇士都是谁	
黔中火种.....	048
——自发组建的贵州首个地下党组织	
海角琼花.....	064
——走近真实的红色娘子军	
白山忠骨.....	082
——杨靖宇将军牺牲的前前后后	
红妆白马.....	099
——追寻抗联女将赵一曼的真实人生	
八女投江.....	117
——八位女英雄是怎么找到的	
雪原孤忠.....	134
——被“开除”党籍仍抗战到底的赵尚志	
擎天一举.....	151
——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真实经过	
狼牙山壮歌.....	169
——还原五壮士舍身跳崖的壮举	

林海寻英·····	186
——还原真实的杨子荣	
“深海”丹心·····	203
——一个真实版的“潜伏”故事	
血色黎明·····	219
——倒在上海解放前夜的警界地下党员	
魂兮归来·····	236
——朱枫烈士遗骨60年返乡记	
山城暗夜·····	253
——《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	
拂晓悲歌·····	272
——“红岩烈士”的临终嘱托	
傲雪红梅·····	289
——江姐的真实人生	
“向我开炮”·····	306
——寻找《英雄儿女》王成最初的原型	
上甘岭军魂·····	323
——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不容置疑的真相	
烈火永生·····	341
——邱少云壮烈牺牲的前前后后	
长空试剑·····	358
——谁击落了美军首席三料王牌飞行员	
子弹在飞·····	375
——上甘岭战役志愿军狙击手传奇	

碧血春花

——李大钊就义前后

侯健美

4月28日，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英勇就义纪念日。

“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碧血几春花，零泪一抔土。”（李大钊悼亡友诗）

近年来，有关李大钊之死的档案陆续被发现，更多亲历者的讲述见诸报端，这使得当初大量缺失的真相与细节日渐显露出来。那段慷慨悲歌、令神州色变的历程，如今正变得完整而清晰。

黑云压城

屠刀其实早在1926年就举起来了。

这年的4月间，直奉鲁豫联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北京。对于城中的革命者，连年混战的反动军阀们表现出难得的一致。联军随即公布的治安条例里特别规定：“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

虐政屠刀之下，北京城里封禁报馆，钳制舆论，共产主义和一切不符合军阀心意的言论都成了杀头的罪名。《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先后遇害。400余名爱国学生上了被通缉的黑名单，说他们有“赤化嫌疑”。受军阀掌控的宪兵团、军警和密探增加了4万余人，他们在京城和学校、报馆、机关、邮局四处打探，闻风而动。一时间，北方群众运动陷入低谷，革命领导人纷纷南下。

尽管如此，奉系军阀张作霖“讨赤”的心意仍不满足，这位“讨赤联军总司令”自从1926年6月进京之后便执掌了北京政权，年底又自我擢升为“安国军总司令”。他早就和军阀头子们商量好，将捕杀邵飘萍、李大钊等人列为特别紧迫的军事行动。

张作霖们对李大钊的痛恨是与恐惧交织在一起的。

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四面受敌，东有张作霖，西有阎锡山，南边还有吴佩孚的人马。危急下，多亏李大钊及时出面，通过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恳请苏联提供军火援助。有了李大钊的奔走，国民军不断扩充军源，并得到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这才具备了与北方军阀相抗衡的资本。

当时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时期，李大钊兼任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领导着京、直、鲁、豫等北方15个省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北方群众运动一波连一波，高潮迭起。军阀们当然将李大钊视作北方的头号“赤敌”。

眼下，邵飘萍已然被除掉，李大钊又在哪里呢？张作霖觉着骨鲠在喉。

李大钊其时并没有离开北京，就待在东交民巷，距离被张作霖当做大元帅府的顺承王府不远。

自打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东交民巷一直就是各国驻华使馆区和兵营的所在地。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未经许可不得擅入，若要进入，必须解除武装。所以，东交民巷成了落难国人的避风港。变法失败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去过；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去过；“辫帅”张勋复辟被讨逆军追得无处可藏时也去过。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严令通缉李大钊等人，说他们“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了躲避通缉，李大钊带着两党机关以及一家老小，搬进了苏联使馆地界儿上的旧俄国兵营，此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法日使馆“举报”

苏联使馆东边、隔着御河就是日本使馆。站岗的日本卫兵最早注意到苏联使馆不大对劲儿，常有中国人进进出出挺频繁。他们觉得奇怪，但也不明其理。苏联使馆的西边毗邻一家法国医院，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听到隔壁俄国兵营的院子里半夜

老有动静，有什么人深更半夜里讲话和争论，仿佛忙得顾不上休息，也不知疲倦。

1926年夏天，躲在俄国兵营里的李大钊的确很忙。彼时，国民军与“讨赤”联军正在北京南口鏖战，奉直晋三大军阀的42个师、47个旅、890门大炮、946挺机枪、59万人马陷在南口的崇山峻岭间。同时，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誓师北伐，很快打到湖南，直逼武汉，锐不可当。

当时的中国乱成一团，从北到南，一路战火不休，信息不畅。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俄国兵营里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转出去。情报的正面写上些不相干的话，背面用牛奶书写，火一烤才显得出字迹。

北方革命力量此时的发展也如火如荼，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北方的共产党员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党员由2200余人发展到4300余人。就连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发展了中共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大帅府秘书董季皋。

苏联使馆里的“动静”引起了法日使馆的注意。不知是有意无意，他们将这一发现告诉了当时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次长吴晋。这个吴晋曾经在法国炮兵工程学校留学，任过驻法国使馆参赞，是个亲法派。他很快将“苏联使馆内可能有赤色活动”的消息汇报了上去。

东交民巷里之后就多了一些一天到晚趴活儿的“车夫”。他们把本就不脏的人力车擦了一遍又一遍，却对招揽客人从不热心；他们漫不经心地闲聊、歇脚，眼睛却一刻不离地盯着东交民巷西口北边的苏联使馆。

叛徒供出藏身地点

李大钊住在俄国兵营是许多人知道的事情。但他的具体地址30号院，本来只有北方区委委员、地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团区委书记等少数领导同志才晓得。

但谁知道，党组织内部竟然出了一个叛徒。他就在李大钊身边工作，还是李大钊的学生。

当时已是冬去春来。但在帝国主义的联络下，蒋介石、张作霖二人合作反共的说法甚嚣尘上，北京城里的风声一天紧过一天。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使馆内外联络工作的阎振山，有天出去送信再也没有回来。送信、取报工作就由帮大家做饭、打杂的张全印肩负起来，可没过几天，张全印上街买菜的时候也失踪了。而大家还

不知道，京师警察厅派出的4名暗探早已借招工之机扮成杂役混进了俄国兵营，专盯着兵营里中国人的一举一动。

但只凭所收集到的表面情况，警察厅还不敢贸然行动。

1927年3月的一天，警察厅里突然躁动起来。西交民巷有情况！

警察迅速赶到，当场拘捕7人，搜出了正在分发的秘密传单。恐怖随即蔓延开去，党的6处秘密机关暴露，100多人被捕。反动军警一下来了精神，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沈维翰亲自出马，连续审讯了3个昼夜，终于发现有一个叫李渤海的嫌犯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就在李大钊身边工作。

李渤海是山东人，1920年夏天入北京大学读书，是李大钊的学生。1923年，李渤海由高君宇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一度前往山东开展革命工作。1925年秋天，李渤海被调到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当过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宣传部长。李大钊避难后，俄国兵营内的共产党组织以及李大钊同外界的联系，多由他承担。

李渤海被捕后叛变的情形，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沈维翰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回忆往事时，才道出多年鲜为人知的内幕。他说李渤海“经多方劝导，颇能合作，将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产分子名单供出”。沈维翰如获至宝，因为李渤海是唯一一个被捕并叛变、而且又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的人物，熟悉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为避免打草惊蛇，警厅悄悄释放了李渤海。除了当事人，此事再无人知晓。

所以，这个李渤海在李大钊牺牲之后还当过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1927年10月，他再一次被捕叛变。后来，李渤海改名黎天才，追随张学良左右，深得少帅信赖与赏识。1955年，身居上海的黎天才以“叛徒、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撤销原判，改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此时，李渤海已死去20年。

此外，1991年4月3日的《文汇报》上还有一种说法，与沈维翰的回忆类似又不尽相同，但也提到了李渤海的叛变：1926年9月，京师警察总署北苑分署在北苑西南一个小村口，抓到一名身上带有“赤化宣传”印刷品的人。此人招认是中共北方区委交通员，并将负责人李渤海供出。李渤海的叛变使敌人获悉：中共北方区委及李大钊等均隐蔽在旧俄国兵营内。不久，特务抓到了一名经常出入苏联使馆的交通员，这人名李大成。特务们把李大成押到前门内顺成街警察署司法处，警察局侦缉处长吴郁文亲自审讯，软硬兼施。李大成就把他知道的情况稀里哗啦全招供了。

最后的脱身机会

进入4月，内外情况都摸清楚了，敌人随时可能收网。但直到最后一刻，李大钊其实还有脱身机会。

张作霖一直有个很大的顾虑：全副武装冲进去抓人，这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历史上尚无先例，就算是打着“讨赤”的旗号，列强们能答应么？为防横生枝节，张作霖决定先派人与苏联之外的各国使馆联系。

4月4日，直鲁联军的总参议杨度听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杨度，字皙子，民国时期的名士。他组织过为袁世凯称帝鼓吹的“筹安会”，也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高官，此时是联军总参议，暗地里却帮着国民党在各军阀之间周旋。

那天，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朋友女儿的婚宴，正好碰上了当过外交部总长的汪大燮。杨度有意无意地攀谈：“外交方面可有新闻？”汪大燮回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此话怎讲？”杨度追问。汪大燮说：“张大帅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要派人进入苏联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

得知此讯，杨度找了个托辞，赶紧离席。

汪大燮并不知道，杨度早在1922年就在孙中山家里结识了李大钊，还常常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李大钊了解军政内幕。俄国兵营里住着李大钊，杨度是知道的。当晚，杨度就把从汪大燮那里听来的消息告诉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并传进了俄国兵营。据说，接到消息，4名革命者马上离开了俄国兵营。可惜的是，李大钊却没有走。

李大钊为什么没走？对这个问题，80年后几经争论，迄无定论。

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李大钊先生传》里提到过王德周（追随李大钊多年，当时是党在天津的负责人）的一段回忆：“在1927年元旦，我和李先生谈：北方区办公地点须要赶快想办法，因为在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以内，去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事情，应趁早迁出。当时李先生的答复是：不要太胆小了，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东交民巷，不容许中国武装入内，是载在条约上的，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绝不是问题的全部。李大钊之女李星华回忆：“那

些日子里，父亲格外忙。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星华常常蹲在旁边呆呆地看着。那些书籍和纸片扔进炉子后，立刻冒起一股浓烟，随后“忽”地一下烧着了，变成一些深灰色、浅灰色的蝴蝶飞了出来，在空中不断地飘舞盘旋。

既然已经在销毁文件，就说明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在王德周的印象里：“二十八号小门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并不是毫无准备，把所有文件，放在炸药的下边，在小门里边看着，如果特务们来了，或发现枪声，就马上用电流通电把它们都烧毁。”

其实，早在杨度之前，就不断有同志、学生、亲人、友人劝李大钊离开北京，也不断有人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到南方参加北伐战争，或者被派往苏联学习。李大钊却总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

这个“事”是什么事？今天已无从知晓。它可能是指策应北伐的各项工作，也可能是某件具体事情。但它一定与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大业息息相关，与北伐战争的成败息息相关。与它相比，李大钊觉得自己的安危是次要的。

被捕



苏联大使馆旧址

因为涉及外国使团，警察厅这次的行动可谓煞费苦心。

动手前，为保万无一失，他们派出一名警察吉世安，最后一次确认李大钊在不在俄国兵营里。这个吉世安从译学馆毕业后，曾被分配到京师警察厅做外事工作，跟驻华的各国使馆都有公私来往。他跑到苏联大使馆，先以

私人关系找到了使馆秘书毕德诺，假称自己跟李大钊是朋友，有封信要交给李大钊，但他自己不便跑到俄国兵营里去，想请毕德诺代转。

所谓的信其实就是便条一张，上面写着“外面对你风声甚紧，请多加注意”，没有上下款。毕德诺一看也没多想，就叫了自己的中国仆人来，让他把信送去西院的俄国兵营，交给李大钊。吉世安由此确定，李大钊彼时确在俄国兵营里。安国军总司令部使命警察总监陈兴亚、宪兵司令王琦等人第二天马上动手。



军警在苏联大使馆周围戒严

1927年4月6日，恰好是清明节，天清气朗。一早起来，星华、炎华姐妹高高兴兴地换上了新夹衣。母亲赵纫兰带了炎华去兵营空场上散步，星华坐在外间长椅上看报，李大钊在里间屋里伏案工作。

吉世安这天也起得很早。因为身负特殊任务，他一起来就换上了中式样斜大襟蓝褂子，布褂长及膝下——平日里耀武扬威的警察，打扮得像个仆人。

包括吉世安在内，京师警察厅这天派出了300余人的行动队伍。带头的人揣着一份正式公文，公文上称：“苏联使馆内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局办事处、庚款委员会等处有共产党阴谋暴动的组织机关，须立即搜捕，事出紧迫，请各国公使准许。”

这当然就是做个样子，因为张作霖早已获得了以驻京公使团团长、荷兰公使欧登科为代表的各国公使的默许。据说，这位张大帅派人对外使团一通吓唬，说是苏联使馆里至少有4000多支枪械，共产党可能要搞暴动，对公使团很不利。对红色苏联本就充满敌意的公使团，也就以“苏联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之列”的托辞答应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当时的《晨报》上有详细的记载：10时30分左右，东交民巷东北各路口突然来了好多洋车夫和穿便服的行路者，过往行人都觉着不大对劲儿。11时，150多名警察、100多名宪兵全副武装，从警察厅出发分路直扑东交民



军警包围苏联大使馆

巷。一部分人把守各路口，剩下的人包围了苏联大使馆。

李星华当时就和父亲在一起，她在回忆录里清晰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座小屋子。……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在这许多军警中间，我发现了被捕的那位工友阎振山，被绳子牢牢地拴住胳膊……他们把他带来，当然是叫他认人的。那个身材粗大、满脸横肉、长着一双恶狼般

眼睛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山：‘你认识他吗？’阎振山只简单地摇一摇头，表示不认识。‘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呢！’胖侦探狡猾而阴险地一笑。”

警察们在绑走李大钊的同时，也没有放过李星华。他们用一条白绳捆住星华的胳膊，拉着她飞快地走出东交民巷，往北穿过邮政总局门前，把她从一个便门带进了警察厅。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赵纫兰母子等33人，以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

从敌人的角度上讲，这次突袭搜捕行动很成功，可谓“人赃并获”。为此，吉世安带着十几名仆人打扮的便衣，在大部队之前就赶到了苏联使馆。他们在领口右边的扣子上拴一根一寸长的白线条，以作识别。10个人首先跳墙进去，外面巡风的人就装作在马路边上晒太阳。这些人的任务就是在行动开始时迅速搜查和保护“证据”。

吉世安解放后交代说，他们闯进去时，屋内正在烧文件，但文件只烧毁了很少一部分。因为是上等纸印的，不爱起火，没有烧透。而且，火很快就被扑灭了，

因为抓捕队居然是带着消防车来的！消防队员还特别装备了水银，用水银灭火，以防对纸质的文件造成伤害。

据说，当天从苏联使馆里拉走了7车文件。李星华看着警察和宪兵来来往往地把一筐筐书报和文件抬进了警察厅的院子。他们像一群捕到猎物的狗，欣喜若狂地忙碌着。

各方营救

军阀料想了搜捕时的种种，大概没有料想到引发的社会影响之大。

事发后，京津各报社评，都为李大钊呼吁。营救李大钊的人亦多方努力，有人论法理，有人道人情，有人捐款，有人奔忙。

4月9日，政府校务讨论会召开，席间提议“李大钊虽属共产党员，究系迷信学说，与故意扰乱治安者情形微有出入，应请当局略迹原情，贷其一死”。9所国立大学校长商定自10日起分途营救。北大校长余文璨、师大校长张贻惠随后前往文昌胡同8号拜访张学良。

政府政治讨论会也在9日召开，全场推举讨论会会长梁士诒、杨度为代表，赴顺承王府向张作霖陈述意见。第二天，两人约同当时的司法总长罗文干一同会见张作霖，也提出将此案移交法庭。杨度将自己在北京的爱宅“悦庐”变卖，所得的4000多大洋全部用来营救李大钊。

章士钊则找到了张作霖身边的红人、奉系元老杨宇霆，历数李大钊得名之盛，言辞恳切地奉劝杨宇霆“切不为以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土，而遗千载恶名”。据说，杨宇霆“闻之悚然，乃向张作霖陈说”。

河北乐亭同乡白眉初、李时等300多人此时联名上书陈情，请求军方保全李大钊的性命，并先行释放赵纫兰母子。陈情书里说李大钊“生长僻壤，游学津门，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如是者数载，继而去国东渡，留学日本，东瀛归来，任北京大学及男女两师大教授，其钻研之苦心，更不减于在津门时”。他们天真地以为，军阀也会讲人情。

此时，西方各国对张作霖的做法也颇有微词。照张作霖的说法，苏联使馆里收藏的枪支不下4000支，而实际搜出来的连百分之一都不到；警察厅本来说的是搜查苏联使馆附属的远东银行、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地，结果却闯进了苏联使馆的直属

领地俄国兵营。各国倒并非担心李大钊等人的安危，只是不愿接受被张作霖连蒙带吓、同意其违反《辛丑条约》的事实。

在英国众议院，一名劳工党议员当众质问外相张伯伦对于北京公使团允准侵入苏联使馆的意见。张伯伦只好含糊其词，说保障安全的权利不能赋予反抗当局的阴谋派。法国的《渥伦特报》认为，苏联在边境厚积军力，张作霖与苏联素有积怨，才有此行动。

苏联人更是怒气冲冲，事件一发生就向北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苏联代理驻华大使率领馆员30余人日后离华，扬言断交。苏联首都莫斯科发生了10万工人、职员大游行，抗议军阀擅闯大使馆，行凶抓人。各国站在不同立场上纷纷敦促张作霖尽快拿出切实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李大钊等人蓄意暴动、反抗政府。

外界压力之下，张作霖赶紧加派人手整理证据。最重要的证据其实就是从使馆搜得的大批文件，堆了满满两间屋。文件有中文的，大部分都是俄文的。

前任哈尔滨交涉署署长张国忱精熟俄文，张作霖特意召他进京成立了“搜查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但凡懂点俄文的政府工作人员几乎全被调用。编译会的人日夜加班，搞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发现组织暴动的计划。张国忱没有办法，就趁晚上陪张作霖吸鸦片烟的时候进言，说这么重要的事情，哪能一下子搞完，求张作霖多给些时间。

重要文件在20日左右编译完毕。日、英、美、法等国使馆的工作人员被允许进入警察厅的俄文检查室拍照，以便将“罪证”送往各国发表。苏联则发表声明称，那些文件都很普通，在任何一国的使馆里都能搜的出来。编译出的文件目录还被陆续地刊登在报纸上。

就在张国忱忙于翻译时，京师警察厅也没闲着，委派了15人专门负责审理。

4月8日的《世界日报》上说：“李著灰棉袍，青布马褂，满脸髭须，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马克思（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云云。”

李大钊光明磊落，问到后来，他干脆说：“你们拿纸笔来，我自己写好了。”于是，就有了后来被广为传诵的“狱中自述”。李大钊三易其稿，最后的成稿有2700余字。

终日为革命奔走忙碌的李大钊，终于借这个机会梳理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共产主义学说，李大钊承认“崇信不讳”。他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一片赤胆忠

心，襟怀坦荡。

除了“狱中自述”，其实还有一份“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里，至今尚未公开。字里行间，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跃然纸上，他讲出伟大抱负和革命主张，也“供”出了国民党在北京、广州、武汉的一些情况和头面人物，不过，这在当时都是公开的。

力主“讨赤反共”的张作霖想要的绝不是这些。他甚至派出自己手下、李大钊的同乡杨宇霆做说客，许以高官厚禄，但也没能从李大钊口中得到苏联“赤化”中国的证据和共产党组织工农运动的情况。所以，警察厅一方面对外界宣称“李大钊口供颇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认“李无确供”。

神秘的“前方来电”

“李无确供”怎么判刑？

警察总监陈兴亚在警厅与顺承王府间来回奔波，送证物、送口供、请示张作霖到底要怎么办。张作霖似乎也没了主意。

张作霖的身边人这时分成两派。一方主张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国家司法机关审理裁判，以示尊重国家法律。张作霖亲信杨宇霆也建议保李大钊性命，认为李大钊本为北方著名学者，不如判个终身监禁，让他在奉天的监狱里继续研究《资本论》。

这种意见在当时呼声最高，所以报纸上的用词也大多倾向乐观：“安国军方面各要人对于本案，其欲依法办理取宽大主义，张作霖亦极赞同”“但闻顺承王府对于此项建议，因其为政治讨论会提出，甚为重视”“党案移交法庭说渐有力”“党案处置办法仍未决定，据传被捕党人均无生命危险”“然最重亦不过无期徒刑，决无生命之虞”……

还有一种意见是军法论处，理由为“共产党在北方显有扰乱阴谋，则依照军法处分，自属适当”。张作霖给军阀张宗昌、孙传芳及前方各路将领都拍了电报，说“本地军警，于晨在使馆界内拘获著名共产党首领李大钊及同党三十五名”，“倘有意见，可即电告”。后来，张宗昌、孙传芳等6名军阀给张作霖的回电中，只有一人“电请量情法办”，其余5人均主张“严办”，山西军阀阎锡山没有回电。

为堵悠悠众口，4月23日，张作霖最终决定派参议何丰林就任审判长，组成由军方一手控制的特别法庭。何丰林是张作霖大元帅府军事部长兼安国军模范军团司